

7414/50

西昌文史

第四辑



主 编	马忠贤
责任编辑	杨 岐
	史在德
校 对	李荣志
	吴艾琼

政协西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雄师指西昌

原一八四师师长 林彰

一九五〇年初，正当我一八四师全体指战员和川西人民抢修都江堰和清剿土匪时，西南军区命令我师协同友邻四十四师解放西昌。具体任务是：我一八四师由北向南进攻，四十四师由南向北进攻，最后形成对西昌的包围，全歼敌军。

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南临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东有大小凉山、鲁南山与云南毗连，西有雅砻江环绕，地形十分险要。蒋介石对西昌早有打算，他曾经亲自到西昌进行勘察和部署。成都战役后，胡宗南和贺国光带领其第一军、第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四军残部等一万多人，勾结西昌地区的封建势力，筹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培植了众多的地方武装，梦想凭借山河天险和这些力量，建立以西昌为中心的所谓“大陆游击根据地”，作最后的挣扎。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师遵照命令，分左、中、右三路从成都出发，向西昌进军。中路部队的路线是经乐山、蓑衣岭、富林过大渡河，再经越西过小相岭至西昌。右路经雅安，过大渡河铁桥，然后经石棉、冕宁至西昌。左路经峨边翻大凉山到越西之大田坝，先敌切断敌一二四军退路，协助主力渡过大渡河。

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解放，我军斗志非常旺盛。而敌军不断溃败，士气非常低落。因此，在整个进军中激烈的战斗很少，事实上西昌战役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渡过大渡河，怎样通过彝民区。

三月十八日，我带领的中路部队与驻守大渡河以北的敌三三五师接触，敌即望风而逃。战士们见到了敌人，忘记了几天的疲劳，越过峰峦起伏、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蓑衣岭，以一天一百多里的行程追击敌人。二十二日深夜，先头部队就赶到了大渡河北岸。战士们望敌人刚刚离岸的最后一只渡船，十分恼怒，端起机枪猛烈地扫射，船上的部分敌人立刻被打入水中。其余纷纷跳水逃命，来不及跳水的敌人，被怒吼的急流冲向下游。

大渡河宽约三百多米，水深流急。加上连日阴雨，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追击，在逃跑前把附近的船只全部烧毁，赶走了老百姓，并在对岸设置了一个连的兵力，配有几挺重机枪防守。我军到河边后，立即召开了会议，一面组织部队到河的上游和下游去寻找渡河工具，一面组织部队利用简便的器材作强渡的准备。同时命令炮兵营迅速展开，占领阵地，以炮火掩护部队强渡。

第一次强渡时，我们用一些旧门板、小筏子，因水流急，河面宽，加之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封锁河面，没有成功。一些同志在强渡中光荣牺牲了。我们正要组织第二次强渡，五五二团在上游找来了一条渡船并带了一位老乡。老乡很好，他一见到我们就高兴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国民党在这一带把我们糟踏苦了。你们快上船吧，我送你们过

去。”渡河立即开始。我们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很快把对岸的敌人压住了。渡船向离弦的飞箭驶向对岸。当船离对岸还有四、五十米远时，敌人火力突然又猛烈起来。为了缩小目标，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冒着敌人的子弹奋力向岸上游去。很快，战士们上了岸，抢占了滩头阵地。敌人看到我军已登岸，无意再战，狼狈逃窜，我们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

部队渡河后，进入了彝族区，走的基本是当年红军长征所通过的路线。彝族地区的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对于国民党非常仇恨，经常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我们知道，彝民对我们解放军也不了解，他们可能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搞得不好，就是暂时通过了，也会给这个地区以后的工作带来困难。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我们一方面要追击敌人，按照上级的意图完成对西昌的包围；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彝民群众的工作，为将来建设这个地区打下基础。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积极争取彝族群众的帮助，通过彝民区，消灭敌人。于是，过河以后，除了做一些其他准备工作以外，我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学习有关政策文件，强调了对彝民工作的意义。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民族政策教育。很快使干部战士掌握了一些接近彝民群众的方法。进入彝民区后，战士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通事”向彝民宣传：解放军即是当年路过这里的红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的部队；汉族、彝族是一家，汉民彝民是兄

弟等等。部队沿途露营在野外，不住群众的房子。无粮无菜，四处挖野菜或饿着肚子也不动群众的粮食和蔬菜。部队每个人都准备了针、线和食盐，见到群众就主动送给他们。一些群众见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他们不打不骂，主动和我们接近，有的还送来了粮食和蔬菜。一位老大爷带着回忆和激动的心情说：“你们一来，我们就觉得你们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很象当年的红军。十几年前刘伯承将军同我们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酒结为兄弟的情况，我们还记得十分清楚。当年红军路过这里非常尊重和爱护我们，赠给我们许多粮食和物品。这些将永远留在我们彝族人民的记忆中。”

进入彝民区的最初几天，不少群众一见我们就跑，有的还抢我们掉队同志的枪支和东西，剥掉一些同志的衣服。有的甚至还把人掠走，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开枪打我们的事件。对于这些，我们都采取了忍耐的态度。渐渐地，群众看我们只打国民党军队，不打群众，便远远地站在山上看着我们，后来站得更近了，以后索性在道路两边看，一些人还主动告诉我们掉队战士行军路线。不久，被抢去的枪支、物品、人员也都送来了。

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各路部队很快接近了西昌。这时，西昌已被我四十四师占领。敌人正在拼命向东逃窜，我们和四十四师会合后，立即开始追歼。彝民群众纷纷拿起武器阻击敌人，使我军很快把敌人包围在甘相营一带。仅经过几小时的战斗，便将敌人全歼。战后，仅据我师统计，敌五兵团司令、六十七军军长胡长清、游击司令罗子渊以下四百余人，被我击毙。敌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沈策、

联防司令羊仁安、靖边司令邓德亮以下七千余人被我俘获，并迫使逃往昭觉的二十七军残部投降。至此，西昌战役胜利结束。

（原载凉山报）

积蓄力量 迎接解放

——西昌地区解放时的前前后后

胡崇钟

中共在西昌的地下组织，自一九三一年建立之后，曾在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境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红军一道，在冕宁建立过“革命委员会”地方政权及地方武装力量“抗捐军”，成为长征史上党中央亲自领导地下党建政、建军的范例，此后，一些同志随军北上，一些同志则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西昌党组织在原特支书记廖质生、中心特支书记陈俊卿及宁属工委书记黄觉庵等同志的先后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到临解放前夕，陆续发展成为一个有八百多彝、汉等民族党员的战斗力量。

一九四八年夏天，原川康特委付书记马识途同志来西昌检查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即指示原西昌地区各党组织及全体党员，要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因此，首先加强组织领导，在西昌健全了由黄觉庵、王月生、李成英三同志组成的宁属工委。又陆续在冕宁、会理、西昌三个县，建立了县委及下属的一些区委，其次积极进行瓦解敌军政的工作。授意所有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掌握地方政权，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如冕宁县党组织就有全县三

分之二的地方政权和三千多条枪的地方武装力量掌握在我们手中。被誉为“地下解放区”。其三、派出部份斗争经验丰富的党员，去边境地区，组织武装暴动。如李逸等同志去会理、会东一带配合会理县委龚成林、胥印侯等同志，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吸收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部队李广惠营，组建了“金江游击一、二支队”，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苏绍章部并牵制了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其四、开展民族工作。发展少数民族党员，作好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全宁属先后发展了少数民族党员瓦渣木基等三十多人。并承认付正达、刘世昌、罗正洪等同志组织的“彝族青年先锋队”为党的外围组织，通过彝族党员作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孙子文、罗正江、罗大英及土司吉绍虞等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靠拢我党。其五、为了详尽地了解地方情况，掌握敌情动态，加强各县间的通讯联络，建立了会理、德昌、西昌、冕宁间的交通联络线，当时抽调了会理益门瓷厂冯家材五同志，礼州的李廷玉、西宁的赵经魁，分段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其六、抓住时机，教育争取瓦解部份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策动他们起义。冕宁的国民党警卫团李三科营，普格的西昌保安司令部钟晓寒中队，德昌的靖边部龙必达连等部队在我们地下党员说服教育下，先后宣布起义。对在礼州等待整编的胡宗南残部也采取各种方法，动员他们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离队，弃暗投明。同时，还做了一些曾参加胡宗南、贺国光召集的“防共会议”成员如张汉碧等地方封建势力派的策反工作。其七、授意全体党员及与地下组织有关系的民主党派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好护厂、护校，

掌握粮仓等准备工作。保证解放大军到达时，社会秩序正常，军需民食不缺。

一九四九年末，成都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国民党胡宗南、孙元良、罗广文、宋希廉等纷纷溃逃。部分残兵败将沿乐西路南下，到达西昌的约万人，国民党西昌警备部司令兼西康省临时政府主席贺国光，纠集各县地方封建势力，组织所谓十个警备分区，号称“十万子弟兵”，打起“忠义救国军”的招牌。企图北扼大渡河，南凭金沙江，以西昌为“大陆反共复国基地”，妄想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胡部败兵未到之前，胡宗南即先行飞来西昌，并空运所谓“国府警卫团”，全美式装备一个营到西昌。由师长祝光祖降格为团长，亲自率领，加强对西昌城区的控制。败兵到后，聚集于礼州，经过仓促整编，仅将其嫡系草草编为一个师，约三千余人。由军长顾保裕（顾介侯）降为师长率领；其它杂牌军约二千余人，编为什么“华南纵队”，由王伯华率领。开往会理、宁南一线沿金沙江布防。另有少部份留在西昌筹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诱骗社会上失学失业青年及纨绔子弟四百多人，施以特务训练，准备长期潜伏待机而动。

此时胡宗南、贺国光还在西昌召集各县地方武装力量头头，如盐边的葛荫堂、盐源的张玉林、会理的苏绍章、普威的吉绍虞、德昌的张汉壁、宁南的李幼轩、冕宁的邓德亮、邓海泉、西昌的孙子文等人，开联合防共会议。大肆封官授衔，发饷拨粮，配给枪枝弹药装备。并加派特务控制，安排电台联系。千方百计拢络土司恶霸，为其效命。

这时，西昌古城，乌云翻腾，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所谓“忠义救国军”到处招兵买马，好象真有一番大有作为似的。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兵分南北，六路进军西昌，贺国光所组织的十个警备分区，立即土崩瓦解，胡宗南残部，四散逃窜，最终全部消灭。

情况分述如下：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云南永仁县龙街胜利渡江的南中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师一部，由我地下党领导的“金江游击一、二支队”作响导，毫无阻碍的顺利抵达会理，紧接着兼程猛进，并肩北上，二十六日拂晓抵德昌，解放军进展神速，当晚到达西昌县境，胡宗南，贺国光闻讯，惊惶万状，立即乘飞机逃走。解放军约在夜晚九时许占领小庙机场。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由汉源县富林场渡大渡河的北中路人民解放军一八四师一部，经越西飞速翻过小相岭，于二十七日午夜在冕宁县属冕山乡（小相岭南麓山脚下）与北进的四十四师会师后，折甘相营（即今喜德县境）追击由西昌北逃的胡、贺残部，由其参谋长罗烈率领约四千余各类人员，包括“游击干部训练班”及在西昌的所有军事单位，准军事单位的人员。在基跃沟一战，由我冕宁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地方武装力量，在党员罗至清及起义军官邓宇凯的协力配合下，全部围歼，几无幸免。当场击毙其高级军官唐式遵、胡长青、孟鲁林、罗子洲等，生俘高级军、特将领沈策、周士冕、羊仁安、王炳炎等，仅罗烈本人只身化装潜逃。

在德昌、普格方面，经过我地下党组织派人进行过策反工作的开明地方势力派，如吉绍虞、张汉壁等均倒戈向我，纷纷放下武器，宣布起义，并主动配合、牵制、收容流窜的国民党军队，如普格土司吉绍虞先生父子，除率本部“金江中游警备司令部”悉数起义外，还主动说服了国民党军七十六师张桐荪部的孙道源团（编号二二八团），在企图经普格去盐边，过云南外逃到缅甸的行程中，向我缴械投诚，该团的一千余官兵及武器，计步枪一千余支，机枪八十多挺，炮二十多门，弹药辎重全部均由四十四师派人如数接收，与此同时，吉绍虞先生父子也将其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部配给的电台、武器、弹药等交给了四十四师，西昌军管会当时曾给吉绍虞先生父子颁发了锦旗，并任命吉绍虞先生为西昌军管会委员。德昌县城也通过当时地下党组织派人做了策反工作，同意起义的地方封建势力头头张汉壁所掌握的“第三警备分区司令部”接收和收容了国民党驻军及流窜部队人、枪四百支、炮四门、机枪一十四挺等等。后均交由四十四师接收。（编者注：张汉壁于1950年8月与盐源张玉林同谋组织土匪叛乱，1951年被镇压）

由云南省巧家县过金沙江，经宁南到西昌的南左路军四十四师某部，也在当时地下党培养的党员对象罗正洪同志（注二）去云南和解放军接上了头，作为响导，很快地击溃守江和盘据在宁南的国民党军，于三月二十七日晨抵达西昌。

西昌城内的国民党驻军及军政机关，在我解放军南北合击，陷于四面楚歌，形将覆灭的前夜，也纷纷北撤东逃，

其中一些接受我地下党组织派人做过策反工作的，如靖边司令部付司令孙子文先生等避开战线，不与我为敌，还借给西昌城区地下党及地下民盟合组的维持地方秩序的武装步枪四百余支，使西昌城区安全度过真空时期，免遭敌特破坏，确保人民群众及国家财产未受损失。国民党由西昌而溃逃的残部，在喜德被歼外，东逃残部之一的西昌警备部警卫部队邱纯川团被与我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彝族上层人士罗大英先生诱进今喜德县红马区全部歼灭，团长邱纯川等被击毙。可惜此役由于行动仓促，也牺牲了罗大英先生所部一些彝族兄弟。东逃残部之二的祝光祖团，企图经大兴场去昭觉，也被我彝族地下党员马拉惹家支及经过罗正洪同志等启发教育过的马格尔等彝族人士全歼于解放沟一带。仅遗一些光杆司令，光杆军长，如尹昌衡、冷光电等逃去昭觉，后经罗正洪等同志做了工作，才回西昌向解放军投降。

此外，在有党组织和党员的地方，均积极主动做了相应的支前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大陆上的国民党最后一个据点——西昌。

遗憾的是在如盐源、盐边一些边远县份，地下党组织还来不及拓展工作的地方，也使解放事业受到了一点阻力，遭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注一：六路进军西昌分为：

一、北左路 自峨边翻大凉山到越西田坝至西昌。

二、北中路 自乐山翻蒙衣岭到富林、越西翻小相岭至西昌。

三、北右路 自雅安翻大相岭至石棉过大渡河，进冕宁到西昌。

以上三路由一八四师负责。

四、南左路 自云南华坪县、宁蒗县到盐边进西昌。

五、南中路 自云南永仁县、龙街渡金沙江过会理到西昌。

六、南右路 自云南巧家县到宁南至西昌。

以上三路由四十四师负责。

注二：罗正洪同志、彝族青年，当时是由我负责培养成熟，准备发展的党员对象，但因我急于去普威，未能履行入党手续，故解放后才先入团，后入党。西昌方面，如孙子文、罗大英等彝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是罗正洪等同志作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

西昌解放前夕胡贺集团 垂死挣扎的丑相

张 籍

(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西昌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奉刘文辉之命在西昌起义。消息传出，西昌城里顿时紧张起来。伍的师部驻仓街城隍庙，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官邸住望远室，相隔一箭之地。望远室由警备团派兵保护，在外围墙上，密密麻麻架上机枪，树丛里架上迫击炮，目标对准伍师部，当时贺国光形同幽禁，躲在望远室里不敢出来，把收发报机也搬到望远室，不停地向台湾请示机宜。贺成天成夜在电报房来回踱步，等待指令，深更半夜无一消息。

过一天夜晚，伍师长鉴于当时实际情况，主动撤出西昌城，从小庙到礼州两侧，贺还布置部队袭击，但伍培英还是安全到达雅安，完成起义使命。

刘文辉起义后，蒋介石命贺国光接任西康省主席职。贺高兴了，把西昌屯委会（地址在现西昌市政府处）作为“西康省政府”在一个艳阳天里，贺国光在“省政府里粉墨登场，举行就职典礼”，“省府”秘书长曹良璧，秘书江国文、程仲勋、王子先（原保安司令官）分任财政、田粮处长，贺身兼数要职（西南军政副长官，警备司令官，西

康省主席），军政大权在握。

正当就职典礼进行时，有西昌西门坡住的赵仲泉者，他说家里母鸡生一个蛋，蛋上有“国民党党徽”，他立即把蛋放在铺着红绫的托盘里，送进“主席府”，向贺主席祝贺，贺十分高兴。

（二）有贺的政工处长且司典者，更想入非非。他为中华民国算命，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人”，辛亥年十月十日2时生，将年、月、日、时、八字排列，写好整齐一张算命单，放在他望远室宿舍桌台上，不时去看看，籍以自慰。我见了“算命单”问他：“处长，你的命呢？”他说：“我一不在数，二不在坊”。言外之意，他要逃往台湾了。

且是四川大邑人，黄埔四期学生，刘文辉的老乡，本不应该反刘起义。然他官迷心窍，竟反其道而行之。

且姓是少见的姓，闻他祖先是满族人，是清王朝在四川的后裔。他出生大邑，家住成都。他胖得象一个冬瓜，有人嘲讽他，站着象个“且”，坐着象个“司”，蹇下象个“典”，故“且司典”其名，他每天早上，在寝室内铺上席垫，望空叩头数十下，祈求“阿弥陀佛”保佑。

一天，且司典“灵机”一动，报告贺国光说：刘文辉的师长唐英，在康定“起义”了，保安司令王靖宇和省参议长周馥香，也“起义”了。于是贺国光叫他去电祝贺。实际他们三人早已起义，且司典用反起义之名，诬蔑起义有功之人，结果康定解放后，唐英、王靖宇、周馥香，被押送雅安三元宫受审，唐英老态龙钟，一只眼睛已瞎，王靖宇体格魁梧，有军人气概，周馥香气息奄奄，命在旦夕。

唐英说：“我是受人诬害的。”且司典一计害三贤，使起义人员蒙受不白之冤。

且司典为了讨好胡宗南，他请求举办一次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同学会”。胡答应他去办，发给他黄金两条，在西昌市场上换得大洋一百六十元大办酒席，新生俱乐部摆了十桌，邀请黄埔军校、南京军校、成都军校、各战干团、军校高教班、政训班等各期“同学”，还请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老前辈“同学”，但这两处“军校”未有人参加。胡宗南派来南军校一期至十四期代表，各战干团、高教班、政训班代表；还有警备部，一三六师少数反起义人员，二九二团、靖边部，均邀代表参加。各“同学”济济一堂，千万声“蒋校长，蒋团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成功，便成仁”响彻大厅。“同学”们酒醉饭饱，偏偏跌跌而去。

且司典官迷心窍，他想当胡宗南的运输兵团司令长官。写了一个“运输计划”从重庆内河水运，西昌空运、陆运，一齐包干。并向部属许愿，谁当团长，谁当营长，谁当连长，大肆封官许愿，结果一场空，还是逃之夭夭。

（三）贺国光在西昌没有做过一樁好事，东西两河是他的铁证。东河水冲到东门城墙下，城墙快决口了，涌泉街一些老妈妈，拿上香烛纸钱，在东门河坝，向石头跪香叩头，祝告洪水不要冲进城来。那些无知的老妈妈，把山上冲下来大块大块的花岗石，名之曰“母猪龙”，当神一样朝拜。这虽然是个迷信，然而对贺国光是一个有力的讽刺。

贺国光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闲人”。

晚上他坐上小汽车到仓街徐获权家去和夫人小姐谈天，徐也由此身价百倍。白天又坐上小汽车，到西街“华宁瓷厂”在柜台里，呆呆坐着，活象一个“老模特儿”。当时华宁瓷厂主人徐仲伟见贺司令光临，大增门楣，百般奉承。

贺之母，八十寿辰，在望远室官邸举行寿庆，贺同夫人历子英，站在“寿堂”侧面，来客向老太太行礼，他夫妇还礼后，就以“鸡尾酒”宴方式招待客人，随到随吃，随吃随去，在西昌宴会上别开生面。

以后老太太死亡，由重庆西南长官朱绍良题纪念册。贺造谣说，老太太死时，庭中有白鹤飞来，意即他老母亲驾鹤升仙而去，以示他们是高贵之家。

（四）一九四九年胡宗南，来西昌，他命令西昌特务头子谈云章（西昌警备部三处长），为“杀人魔王”戴笠举行追悼会，想藉此以团结西昌特务人员，进行反共。会场设新生俱乐部。从大门到正厅，墙上地下，全用柏枝叶铺满，正中扎一个灵堂。灯光在柏叶间，惨淡无光，阴森森、凄惨惨，大厅上挂一张戴笠画像，台上燃起九支蜡烛，灵堂里一片阴暗之色。这个杀人魔王，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灵魂，毁灭了多少人的家庭儿女。追悼会只邀请贺国光、罗烈、李犹龙、曹良璧参加。军统在西昌的头目谈云章夫妇、陆清澄（原处长）、特务科长范岳生，特务秘书韩靖邦、特务爪牙邓慎修、张刚志、陈洪模、谢邦寿等及其他“正牌特务”“鸡牌特务”，杂烩一堂，开了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议，以求保存那个“杀人堡垒”。结果天不人佑，人民解放军一到西昌，这班狐群狗党都烟消云散了。

（五）胡宗南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给蒋介石在大